

地方年鉴学概要

梁耀武 著

云南科技出版社

PDG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建立地方年鉴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1)
第二节 地方年鉴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	(6)
第三节 方志学与地方年鉴学	(9)
一 章学诚“设志科”的创议与方志事业的连续性	(9)
二 民国时期方志学家的志鉴合一观	(11)
三 “方志危机”论与地方年鉴热	(12)
四 方志学与地方年鉴学理论的相互渗透	(14)
第四节 地方年鉴学与编辑学	(16)
第五节 地方年鉴学的方法论	(19)
第二章 结构	(26)
第一节 地方年鉴的结构特征	(26)
一 多体并用 分类系事	(27)
二 多层综述 分地概述	(30)
三 整体构成的划分方式	(32)
四 认真做好总体设计	(34)
第二节 特载和专文	(41)
一 特载之“特”和专文之“专”	(41)
二 党政公文编排方式	(44)
第三节 政区整体概况	(48)

一 地方志书的“概述”与地方年鉴的“总述”	(48)
二 政区整体概况的结构	(51)
第四节 下辖政区概况	(53)
一 位置	(54)
二 容量比重	(54)
三 结构方式	(56)
四 概况也应条目化	(61)
第五节 大事记	(63)
一 渊源	(63)
二 功能	(64)
三 体裁	(65)
四 标准	(66)
五 大事记研究的新趋向	(67)
第六节 分类结构的体式与分解	(68)
一 新方志的三种体式	(69)
二 地方年鉴的体式	(70)
三 二元划分标准的困惑	(74)
四 构成要素分解	(78)
附: 栏目和栏目化	(80)
第七节 人物	(85)
一 史传与志传的异同	(86)
二 地方年鉴“人物”部类的编排特点	(87)
三 有待研究的几个问题	(89)
第八节 二次文献、统计资料和附录	(91)
一 二次文献	(91)
二 统计资料	(92)
三 附录	(94)

第三章 条目和条目化	(98)
第一节 地方志书中的条目	(98)
一 什么是条目	(99)
二 条目在志书中的特殊地位	(100)
三 条目的主要特点	(100)
四 新方志中条目的变化	(101)
五 志鉴条目的差异性	(103)
第二节 年鉴条目是结构单位	(104)
一 两种定义	(104)
二 独立性与包容性	(107)
三 类目与事目	(109)
四 稳定性与变异性	(111)
五 以物系事和以事系物	(112)
六 孤目化与无点之面	(113)
七 隐形条目与分解层次	(114)
八 条目的本质属性	(116)
九 条目的地位和作用	(117)
第三节 时段	(119)
一 年度性时段	(120)
二 事件性精确时段	(125)
三 超年度时段	(128)
第四节 条目选材	(133)
一 条目选材的一般原则	(133)
二 行业发展情况	(136)
三 专项管理	(137)
四 专项业务	(138)

五	新事条目	(140)
六	要事条目	(144)
七	态势性条目	(150)
八	资料性条目	(156)
第五节 条目写作 (上)		(161)
一	确定要素 认真选材	(161)
二	崇实忌虚 直陈其事	(163)
三	突出重点 变处着墨	(164)
四	“水落石出”与“水涨船高”	(165)
五	选准角度 详略互见	(168)
六	交代原因 记述结果	(170)
七	画龙点睛 有所启示	(171)
八	以人述事 以事托类	(173)
九	年度综合 反映特点	(174)
第六节 条目写作 (下)		(176)
一	把握趋势 分述特点	(177)
二	选择标志 体现变化	(179)
三	分类剖析 说明态势	(180)
四	扣紧要素 反映总貌	(182)
五	昭示得失 喜忧同报	(183)
六	纵述发展 横陈新绩	(184)
七	要素分解 重点立条	(186)
第四章 编辑工作		(188)
第一节 从方志编纂到年鉴编辑的角色转换		(188)
一	编纂与编辑	(188)
二	编辑意识与年鉴意识	(191)

第二节 地方年鉴编辑的基本素养	(195)
一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195)
二 马上功夫和马下功夫	(196)
三 苦练基本功 补充新知识	(198)
第三节 主编	(200)
一 整体性与科学性	(201)
二 勤于探索 常办常新	(204)
第四节 索引编制	(207)
一 索引是年鉴的钥匙	(207)
二 索引范围	(210)
三 索引深度	(210)
四 主题标引	(212)
五 主题编排	(215)
六 索引编制程序	(219)

附录:

十年来我省年鉴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220)
一 志鉴比较研究	(221)
二 年鉴的性质、特征和功能	(224)
三 条目和条目化	(227)
四 概况编写研究	(230)
五 期刊编辑学研究	(231)
六 突出重点 开拓新领域	(234)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建立地方年鉴学的 必要性与可行性

从 80 年代兴起的我国年鉴事业，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产物。各种专业年鉴、国家级年鉴、百科年鉴以及省、地、市、县以各级政区为范围的地方综合年鉴大量涌现，并在实践的基础上，出现了一批理论研究和学术专著，对系统总结年鉴编辑经验，掌握年鉴基本知识，探讨操作规范等，起到很好的作用。但是年鉴作为一个内部构成较为复杂的系统，各种功能作用不同的年鉴差异性是很大的，要深化年鉴理论研究，应当考虑创立不同的分支学科。

1992 年，邵荣霞同志著文论及年鉴分支学科，认为这是 90 年代年鉴事业发展的新趋势，“我国年鉴家族分门别类已有不少分支，相互之间既有共性又有鲜明的个性。譬如：综合性年鉴与专业性年鉴就有很大差别，百科年鉴与地方年鉴有明显不同，统计年鉴则更是独树一帜，近年来应运而生的企业年鉴在某些方面就有其独特的优势和特点，这些都要分门别类地加以研究。分类研究是深化年鉴理论研究的必然结果，也是年鉴研究走向科学化的必然途径。因此，今后的任务，既要研究共性，完善年鉴的基本理论体系，也要研究个性，发展分支学

科。90年代,可望产生的分支学科有专业年鉴编辑学、地方年鉴编辑学、城市年鉴编辑学、统计年鉴编辑学、企业年鉴编辑学等。”^①

建立地方年鉴学,并不意味着对年鉴学中某些内容的机械分解,而应当在缩小研究范围的情况下,对地方年鉴编辑工作特殊性深入剖析,在加强特殊性研究中丰富年鉴学的研究内容,拓展年鉴学的研究领域。一般与特殊,是对立的统一,二者缺一不可。邵荣霞同志曾就年鉴规范化问题具体讲述这个关系,认为“只有分支年鉴编辑学建立起来了,当各类年鉴分别找到了自己的个性、特点、编纂规律之时,确立规范也就水到渠成、迎刃而解了。而且,只有这种分类编纂规范才是针对性强、具有可操作性的有价值的真正意义上的规范。”^② 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只有对特殊性作深入研究之后,才可能找到一般性规则,这正好说明年鉴学作为母学科与其分支学科的关系,既以其基本原理覆盖指导分支学科,又从分支学科的特殊性研究中来拓展深化自己基本原理的概括度和精确度。所以地方年鉴学的创立,应在谋求特殊性的深化认识中丰富和拓展年鉴学的研究内容,增强年鉴学的科学性和实用性。

实践呼唤理论,建立地方年鉴学是为了适应地方年鉴事业发展的需要。但从目前的条件看,地方年鉴学是否能够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分支学科呢?一个学科的确立,其基本条件是要有自己独有的、可划分出来的研究领域。地方年鉴蓬勃发展,形成一大批物化产品,有一支专业编辑队伍,有特定的读者对象,并在实际工作中积累了十分宝贵的经验,从客观条件上

①《武汉志通讯》1992年第2期。

②《对年鉴规范化的几点思考》,载《年鉴信息与研究》1995年第4期。

讲，地方年鉴学有条件成为年鉴学中一个分支学科。

但是，就现状而言，地方年鉴学还未形成一门学科，因为从事此项工作的多数同志是从地方志岗位走上年鉴编辑工作的，志鉴之间虽有许多相近或相同之处，但方志学与地方年鉴学毕竟不是一门学科。地方年鉴编辑研究还处在萌发阶段，特别是借鉴介绍国外地方年鉴编辑方面的文著甚少，往往以中国方志学的某些概念表达来阐述地方年鉴编辑工作，自身学科的体系，基本概念界定还处在孕育期，所以地方年鉴学目前尚处于潜科学状态，其特征是实践经验正在升华之中，学科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借用其他学科的基本概念较为普遍（如方志学中的“地方特点”、辞书学中的“条目”等），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应当在实践中努力使之学科化，使其从潜科学状况逐渐浮出水面。就目前而言，建立地方年鉴学应着重考虑以下四点。

一是系统总结地方年鉴的实践经验，使经验上升为理论。地方年鉴学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学科，理论来源于实践，又反过来指导实践。年鉴界近年来有不少关于地方年鉴编辑工作经验的好文章，应当努力从经验描述性向规律抽象性转化，在转化过程中使其由分散的、个别的上升到一般的普遍的原理，由具体感性的总结上升到抽象思维的原则，这正是建立地方年鉴学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工作。这其中，最为艰巨而又不可缺少的工作是基本概念的抽象，这是建立地方年鉴学的关键，因为种种经验的抽象最终必须凝集浓缩到这一基本点上。任何一门学科都应有自己特有的基本概念，否则就会像一盘散沙，缺乏理论凝聚力。在确立自己的基本概念的基础上，形成适用于地方年鉴的基本原理原则，原理就是概念的展开，而概念则是基本原理的凝结，形成概念与确立原理，是同一过程中的两个方

面。

二是必须贴近主源学科。地方年鉴学是年鉴学分支学科，其学科知识体系必须与主源学科相一致。就一般而言，年鉴学主要包括年鉴基础理论、年鉴史、年鉴编辑方法三个部分。而地方年鉴学则不一定去详述年鉴基础理论，那是对包括所有年鉴在内的年鉴事业作理论抽象概括，年鉴史的研究也可以在年鉴学中求得解决，地方年鉴学则重点探讨自己的个性特征，这种个性特征的研究，既要贴近并运用主源学科的基础理论，也将丰富、发展主源学科的基础理论研究。

三是要积极吸收相近学科的研究成果。地方年鉴从记述反映的对象、性质、功能、条目写作和编辑成书方式，与地方志较为接近，在理论表述上与方志学交叉甚多，在编辑中与工具书编纂学、期刊编辑学也有一定的关系，应当积极而稳妥地吸取相关学科的某些内容和方法以至概念，某些理论体系等，来丰富自己。在引进中创造，是创立地方年鉴学的重要途径。地方年鉴学与方志编纂学、工具书编纂学和期刊编辑学等学科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就可以从其它学科中引进有关的理论、原理、概念、术语，再结合地方年鉴编辑工作的实际，加以消化、改制、创造，建立符合地方年鉴学个性特色的理论体系。关键在于不能照搬，而是结合实际再创造，这正是地方年鉴学从其他学科中分化出来的过程。年鉴界曾热烈讨论过方志与地方年鉴的异同，但不可能以方志编纂学代替地方年鉴编辑学；《辞书研究》发表不少年鉴理论研究成果，但辞书学也难以包括地方年鉴学；期刊编辑学的理论研究在年鉴界讨论不多，一般从时效性、条目的稳定与变异，常办常新等具体问题着眼，但也说明某些交叉部分有共性特征。所以我们建立地方年鉴学，在认真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首先要积极引进，也

就是分离出与其他学科交叉部分，形成自己的“小而全”的学科体系。现代科学发展趋势，一方面各学科不断分化，各专业领域向微观层次深化，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越来越精细；另一方面各学科之间又往往相互交叉、渗透，在广度上拓展。地方年鉴编辑学是学科分化的产物，虽然目前处在不太成熟的潜科学阶段，潜科学浮出水面成为看得见的显学科，关键在于能否形成适应于研究对象的理论体系，包括基本概念和理论框架，除开紧密联系实际，加速促进从经验型向理论型转化外，还必须接受显科学向潜科学的渗透，吸取交叉学科的营养来丰富自己。实际上是一种在分化过程中的横向联系，既要从分解后的研究对象出发追求研究深度，又要从相互联系中求得借鉴。

四是提倡学术上的深入探讨，鼓励在不同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探索。我国地方年鉴编辑出版时间不长，实践中需要给予理论说明的问题不少。起步初期，接受百科年鉴提供的模式和理论指导，无疑是十分必要而又有明显的效果，随着实践的不断深入，一些差异性便明显化。金常政先生曾指出：综合年鉴有新闻年鉴、百科年鉴和统计年鉴（指综合统计年鉴）之别，“百科年鉴反映的主要是基本知识的发展，为百科全书的修订积累材料；新闻年鉴反映的主要是重要事实的发展。其次，二者的编辑部门不同，新闻年鉴多是通讯社、报社编的，更靠向新闻报刊的性质，可以说‘年刊’的性质更多一些；百科年鉴多是由百科全书出版社编的，更靠向百科全书的性质，可以说具有百科补卷的性质。”^①而地方综合年鉴多是由各级地方志办公室编辑，往往带有为下届修志积累资料的动机与做法，虽然也象新闻年鉴那样主要反映重要事实的发展，但方志学的渗透很

① 《试论年鉴和年鉴编辑工作的性质》，载《年鉴通讯》1984年第1期。

强，这一点，年鉴界的一些同志深有感触。在众多的年鉴种类中，地方年鉴受中国方志学的影响较深，因为从内容到形式与方志最接近（但不等于），编辑队伍中熟悉方志学的人员占大多数，并且从地方领导到编辑人员多数都把地方年鉴视为方志事业的组成部分，这就从整体上显示了地方年鉴与其他年鉴的差异性。就年鉴编辑理论而言，由于年鉴内部的差异性，对一些具体的，甚至是某些重大的理论课题也有不同看法，如年鉴条目的科学定义，年鉴规范化的不同理解，年鉴转轨变型的探讨，年鉴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等。这些不同看法，正说明年鉴界学术空气活跃，也只有在认真贯彻百家争鸣，提倡学术探讨，多做具体研究，才能促进各分支学科的早日形成。

第二节 地方年鉴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

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是否确立，是一门学科能否成立的基本条件。学科分类是以矛盾的特殊性为前提，地方年鉴学主要以地方年鉴编辑中的特殊运动形式所包含的特殊矛盾为自己特有的研究对象，其任务在于揭示编辑活动中特殊矛盾运动的特殊规律。地方年鉴学的研究对象，不仅仅是编辑工作，应当反映地方年鉴编辑活动的规律，而规律就是关系，就是编辑过程中种种矛盾关系，所以地方年鉴学的研究对象要落实在研究制约编辑活动的各种关系上，集中探讨作者（摄取信息）、编者（组合优化信息成为物化产品）、读者（接受并使用信息）三者的关系，从理论上阐述这三种关系，以构成地方年鉴学的基本理论框架。

集中研究这三者关系是因为作者、编者、读者都是从地情

认识这一共同目的处在一个统一体中，“鉴往知今”的总体特征一致。作者、编者、读者相互依存，缺一不可。读者需要地情信息，作者为读者提供地情信息稿件，编者按社会要求有导向地组合优化信息而提供物化书籍得以传播。就在这样的相互联系中，把地方年鉴编辑活动放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去考察，而不是仅仅着眼于编辑部内部的组稿、审改、发排、校对、出书这些环节。当然，这些具体环节也要研究，如年鉴的时效性，受作者撰稿的时效制约，但是作者和读者的供求关系也制约或影响着这些环节，与读者及时掌握年度信息需求也有密切关系。所以地方年鉴学不应封闭式地研究编辑工艺，而应把年鉴编辑赖以生存的社会关系包括在研究范围之内，这样来探索地方年鉴编辑活动的内在规律。

地方年鉴学的研究对象集中在作者、编者、读者三者关系上还能充分反映作为编辑主体的编者的能动性。三者之间，起支配作用的是编者，或者说在地方年鉴等距离周期性地情信息汇集传播递进运转中编辑主体的能动性与制约这种能动性的各种矛盾，是地方年鉴编辑过程中的主要矛盾，其他一切活动都围绕这个主要矛盾运转，这一主要矛盾制约影响着整个编辑工作。这样，我们就抓住了编辑活动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编辑主体，由此而展开和确定整个学科的研究范围，形成相对稳定的理论框架。

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对象是确定学科研究的是属哪一类事物和现象，范围则是这个学科研究的大体边界以及内容包括哪些主要方面，而边界往往处于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地带。按照上述所讨论的研究对象，地方年鉴学的研究范围大体如下：

一、从读者的需求和作者可能实现的结果出发，编者对地

方年鉴整体内容的设计和规范要求，包括地情综合性的对应反映，分体、分类、分地的结构设计 with 内容体例要求，地情宏观、中观、微观不同层次内容体例要求，稳定性内容与变异性内容的安排及内容体例要求等等。这集中反映在编者的框架设计及编写要求上，这些设计和要求，正是从读者对地方年鉴的需求出发，又从作者摄取地情信息的实际可能性考虑，只能由编者精心考虑而提出来。不断优化这种设计与要求，正是地方年鉴等距离周期运转中发挥编辑主体能动性的体现。

二、地情信息条目化，是地方综合年鉴区别于其他年鉴的重要特征。如何指导作者收集消化材料，写好条目，以便于读者检索使用。其中如地方特点、民族特点的反映，年度特征的把握，指导思想的体现，舆论导向的确定，以至全书条目整体规范要求等，都应当从年鉴的社会功能，即读者需求角度而由编辑主体认真思考，并提出具体要求，组织相对稳定的作者群去实施。地情信息条目化的不断优化过程，是编辑主体在地方年鉴等距离周期运转中发挥能动性的重点，也是地方年鉴编辑部凝聚作者群的主要目标。

三、地情信息物化并逐步实现商品化。主要研究编辑主体如何通过组稿、审改、加工、出版发行、经营管理及宣传方式，让作者之产品为读者所使用。这当中，既要研究物化商品——具体的一册年鉴，也要研究人——编辑主体的智力结构、经营才能和学识水平，对作者与读者的能动作用。而年鉴既是精神产品，凝集着作者和编者的思想成果，但又是一种物质产品，需要货币成本，又将进入市场，并将随着地方年鉴事业的逐步发展，逐渐向商品化迈进，这虽然一时不能实现，但作为等距离周期运转的年刊性书籍，总要做这方面的考虑。

地方年鉴学要不要把地方年鉴的一般特征作为研究对象

呢？一般来说，年鉴的性质、特征、功能，年鉴发展史、编辑指导思想，一般编辑工艺及地方年鉴与其他年鉴的一般差异性等内容，是地方年鉴学的母学科——年鉴学的研究内容。地方年鉴学应在特殊性中深化自己的研究重点，只涉及与其他年鉴有差异性，即个性较强的部分，其共性特征，一般不作讨论。

从上述地方年鉴学的对象和范围可以看出，地方年鉴学属于应用科学，源于地方年鉴编辑实践的经验总结，又用于指导编辑的实践活动，侧重于具有地方年鉴特点的实践经验的理论归纳。但应用科学也应有自己的理论形态，要有“学”有“术”，不能孤立地就事论事讲具体操作方法，也只有这样做，各分支学科的理论探索，对包括各种年鉴在内的年鉴学理论才有丰富推进之作用。反之，以各种年鉴为共同研究对象的年鉴学则应在理论层次上提高抽象度，增强覆盖面，注重对基本规律和方法论的研究，如果都停留在一个理论层次上，都讲一些相同的概念原理，那统一的学科体系将消失在分支学科的多样化之中。从这点看，作为突出应用性的地方年鉴学的建立，也是对年鉴学的促进。

第三节 方志学与地方年鉴学

一 章学诚“设志科”的创议与方志事业的连续性

中国地方志有两大特点，一是普遍编修，二是代代相传。普遍编修从共时性构成省、府、州、县地情系统，代代相传从历时性保持地情变化的动态连贯性。如何处理连续性，长期以来为方志界所关注。图经是方志定型前记载地方情况的专书，

也是地方志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形式，据仓修良先生研究，图经的名称，最早出现于东汉，到了唐代，图经的编修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政府已经设立专门史官管理此项工作，并明确规定编修期限和办法。《新唐书·百官志》兵部尚书条载：“职方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掌地图、城隍、镇戍烽候、坊人、道路之远近及四夷归化之事。凡图经非州县增废，五年乃修，岁与版籍偕上。”又《唐会要》卷五十九，《职方员外郎》条记载：“建中元年（780）十一月二十九日，请州图每三年一送职方，今改至五年一造送，如州县有创造及山河改移，即不在五年之限，后复故。”可见当时明确规定，原来是三年一修，后改为五年一修。从条文规定来看，若遇特殊情况，如“州县增废”、“山河改移”等发生，则随时都要造送。这种制度，虽在时间短促的五代亦未间断^①。宋代以后方志逐渐取代图经成为定型地情专书，编修的间隔也有考虑，如清代曾明令六十年一修，但实际执行的结果不一，时停时修，前后间隔太长，中间则无人过问，到修志时，又感到搜集资料之艰难。有鉴于此，清代著名方志学家章学诚在《州县请立志科议》一文中，从搜集积累资料出发，提出设立志科的主张。建议设专门修志机构，平时注意收集整理资料，妥为保存，修志时就有资料可用。并对搜集的范围、保管方法及四乡设置采访等也提出具体建议。这个建议虽未实施，但却给我们一种启示，就是在当时的条件下，章学诚从资料搜集不能到修志时来突击抢救，应当平时办理，设立专门机构，采集保管资料，以备修志之用出发，把方志编修事业，由原来间隔而又不稳定的间断性，变为一项经常性的日常工作，“志科”从某种意义上讲，则是一种地

^①见《方志学通论》第二章，齐鲁书社1990年版。

方史官机构。从地方志的连续性来讲，一个地方多次续修志书是其主要形态，在前后续修的中间保持方志工作的连续性，是章学诚的一个设想，他看积累资料的重要性，但限于当时历史条件，未寻找到一种及时提供资料以达使用的方法和载体，这是历史条件的局限，也是中国传统方志学无法解决的问题。

二 民国时期方志学家的志鉴合一观

本世纪初，随着西方文化的不断传入，中国历史学及其分支学科方志学，对传统方志理论进行整理和反思，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其中之一，就是设想把西方传入的年鉴纳入方志体系之中，改变原来方志的间隔性，而成为一种连续性的工作。这是西学东渐之后中国方志学发生的一个大变革，核心还是地情资料的连续性，也就是方志事业如何能成为一名经常性的无大跨度间隔性工作。1939年，黎锦熙先生在《方志今议》一书中说：章学诚《方志立三书议》，除“志”之外，其“掌故”、“文征”二书，即为保存地方史料之用；又其《州县请立志科议》，主张于州县衙门内设立“志科”，即为征集地方文献之常设机关也。民国十八年蒋氏梦麟在浙江省政府提议方志新体例及进行办法案，主张解散旧志，分编三书，其三书除“省史”外，“年鉴”及“专门调查”二书，实与章氏于“志”外分辑“掌故”、“文征”二书，用意相仿，特其目标一重在存史，一重在致用耳。黎氏所论，可以说是把年鉴与地方志从理论视角上进行论述，从存史与致用，史料与史书的关系上看到二者的统一性。从功能上看，黎先生还认为：“年鉴之体制颇卑，直昔日之类书目；然其功能绝大，今之一切学术研究与施政设教乃主经商企业皆资之。年鉴必发轫于地方，而后综合于全国，参加与